

# 播火者

##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追访记(上)

□ 朱海燕



的委员在昆仑桥南岳庙后面召开会议,毛泽东又赶来参加。会上,农会干部汇报,有个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说“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弄得乡里不安宁。”留在乡下的小劣绅怕打人另册,却愿意出十块钱来参加农民协会。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向大家提出四条任务:第一是要积极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领导运动;第二是要争取党的公开领导;第三是要建立农民武装,成立湘乡农民自卫大队;第四是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一定要镇压几个,树立革命的正气,压倒反革命的邪气。

在湘乡,毛泽东还到离县城八里路的泉塘,湘乡第十区五乡农民协会进行了调研。

毛泽东在湘乡考察农民运动的几天里,邹祖培天和毛泽东在一起,毛泽东给了邹祖培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为邹祖培大胆领导农民运动指明了方向,使邹祖培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邹祖培第三次见到毛泽东时,已经是1954年7月了。邹祖培在北京参加全国供销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28日会议闭幕那天,他忽然接到秘书处的通知。毛主席要接见他和韶山的毛继生和另外一位同志。此时,毛泽东正在北戴河。他们赶到北戴河,毛泽东详细地向他们询问了湘潭和湘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和人民的生活情况。之后,毛泽东邀三位乡亲下海游泳。旁边的工作人员看这几个地地道道的乡巴佬,总是笑个不停。毛泽东批评他们说:“你们笑什么,没有他们在农村中领导生产,我们就要饿肚子。”此话,令邹祖培铭记了一生。

在湘乡县城西南处的张江渡口,渡过湘江,向肖家冲走去。肖家冲是一个十几里长的山道,道路两旁坐落着许多村庄,其中一个叫横铺的小镇,那里是作家肖三的故乡。肖三原名莼三,号子。1910年秋,毛泽东入湘乡县高等小学读书时,即与肖三同学。毛泽东后来谈到这段小学生活时说:“我以前从来没见过那么多孩子们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极少农民供得起孩子上这样的学校。我比别人穿得好,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学生们不比我穿长袍,只有教师才穿,而洋服则只有‘洋鬼子’才穿。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可是在他们当中也有我的朋友,特别有两个人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毛泽东提到的住在苏联的这位“作家”就是肖三。

1914年至1918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也与肖三同学。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的新民学会成立,肖三即是会员之一。他们共同参加了“五四”运动,在北京、上海也曾在一起活动。1919年3月,毛泽东曾在上海的码头送上送别蔡和森和肖三等赴法勤工俭学。

肖三192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毛泽东此次来到横铺,在这里召开农民座谈会,看望了肖三家人。有人说,晚上他住在肖三的姐姐九根家里。另有一说,他住在区农协委员方长培家。

现任横铺村委会主任的肖元述是肖三的近族,他说,毛泽东在横铺住了三天;但从文字记载的时间推断,毛泽东在横铺可能只住了两天。他在湘乡二三区农协办公地址易道堂,与区农协委员方长培和唐百高、王去清等人进行了座谈。对该区农运工作作了详细调查和重要指示。1月15日,他从横铺出发,越过湘乡和衡山的界限分水岭,便进入了衡山境内。

### 五

白果是衡山西北边缘的一个小镇。这里既是革命的桥头堡,也是反革命的桥头堡。这里是岳北农工委发起人刘东轩和谢怀德的故乡,也是湖南省长赵恒惕的故乡,还是毛泽东的老师符定一

的故乡。1922年,白果人刘东轩在水口山铅锌矿做矿工。这年11月,安源党组织派中共湘区委员蒋先云及共产党员谢怀德、方复胜、李庆如等四人到达水口山。蒋先云等人到达水口山的第二天,就在康家戏台挂起了“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筹备处”的招牌。两天,就有3000余人报名参加俱乐部,很快就开展了各项活动。经过多次的考验,不久,刘东轩由蒋先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俱乐部成立那天,刘东轩被选为副主任。

那时,中共湘区书记是毛泽东。湘区委办公地点在长沙市清水塘。

入党之后,刘东轩在蒋先云的带领下,多次到长沙清水塘拜见毛泽东。

1922年12月5日,在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的周密策划下,水口山铅锌矿工人举行大罢工。大罢工开展之后,毛泽东得知水口山矿区的工人有三分之一是来自衡山县岳北的贫苦农民,他以战略家的眼光分析,工人的罢工和农民的农运必须结合起来。单凭工人与资本家斗,力量单薄,难以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工人必须有自己的同盟军,这个同盟军就是广大乡村的农民。只有工农紧密结合,革命才能成功。湖南农民运动的烈火先在哪里燃烧为最好呢?

毛泽东认为,衡山岳北是个最理想的战场。衡

山岳北是湖南军阀赵恒惕的老家,当地的赵、廖、刘、唐四大姓的土豪劣绅仗仗赵恒惕的势力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害得贫苦农民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纷纷外出讨荒要饭。一首民谣作了非常形象的描述:“正月欢欢喜喜,二月没粒米,三月糲糲餐,四月难过关,五月莫奈何,六月盼割禾,七月收成好,八月交租了,九月米桶空,十月借过钱,十一月打毛票,十二月当棉絮。”白果街上的刘家大屋80多人,完全是讨荒要饭的叫化子。

水口山矿工人罢工的消息,很快传到岳北。岳北农民无比激动,他们暗中奔走相告,决心尽快团结起来,与地主、土豪、劣绅作斗争,也来个天翻地覆的运动。

毛泽东了解了这一形势后,认为岳北好比一堆过了三伏天的干柴,只要把火一点,就会燃烧起来。目前,就缺点火的人。谁去点火呢?他想了很久。最后选中了来自岳北的刘东轩和谢怀德。

谢怀德,又名谢祥七,出生在白果街上一位姓谢的铁匠之家。因家境困难,他没进过学堂,10岁便随父亲打铁,一打就是十个春秋,不仅练就了一手打铁的好技术,而且炼就了刚烈的性格。他参加了安源大罢工,并且在安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和刘东轩领导了水口山的工人大罢工。

1923年春夏之交,刘东轩和谢怀德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回到了衡山岳北。在岳北成功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岳北农民运动总要有个组织名称才行呀!起个什么样的名字才好呢?刘东轩请教毛泽东。

毛泽东说:“就叫岳北农工会吧!岳北不仅农民多,手工业也有一定的规模。”毛泽东提议,岳北农工会由刘东轩和谢怀德分别担任正副会长。

1923年9月16日,岳北农工会正式成立。这天,晴空万里,暖风习习,丹桂飘香。白果刘捷三公祠门前的沙洲上人山人海,来自方圆10多公里

的约4000多农民及手工业者欢聚一堂,庆祝岳北前所未有的大喜事。

刘东轩宣读了农工会文告:“敬爱的农民们,我们在世界上占了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地位,但是,我们在民权地位上除了叫苦、叫冤、啼饥号寒,日夜劳得汗如雨淋之外,什么都没有啊!读书吧,学校要有钱的才可进去;要住房吧,好一点的房子,我们一进去,房主即疑我们是偷窃,扒摸;要吃饭吧,轮到青黄不接时,提起钱没谷米;要穿衣吧,洋人把中国的棉花价格提高全部收去了,使得我们自己无棉纺纺织布。其他如做官得了钱的人,挟着官威强买田;做官要得钱的人时常预征钱粮。外国人暗中使中国军阀互相打仗,到处用兵,弄得我们今天被拉夫,明天被派差,在路上受殴打。外国人把洋货送到中国来,弄得我们从前用手艺做出来的货,哪里还值钱啊!我们现在种种的压迫,是我们没有抱成一团,没有向敌人进行过有效的反抗。现在我们知道了,要为自己解除困苦,争得利益,只有大家联合起来!”

刘东轩的讲话,像春雷震撼大地,像号角催人奋进。台上台下群情激奋,振臂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消灭高利贷!口号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沉睡千年的衡山岳北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奇观。

后来,毛泽东得到这一消息后,对蒋先云说,农民运动如何开新局,工农如何结成联盟,衡山岳北开了个好头,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岳北农工会的诞生,宛如春风劲吹。不仅白果、新桥、东湖等地有68个农工字的农民积极响应,而且毗邻的衡阳、湘乡、湘潭等县的农民也纷纷加入,农工会会员剧增40000多人。一夜之间乾坤巨变,衡山岳北成了农民的天下了,所有的“白脚杆子”,只好拜倒在农工会的“泥脚杆子”之下。新桥地主胡育嘉、刘碧臣、赵念慈等企图因死农工会,牟取暴利,不顾岳北人民的幸福生活,悍然押走谷船100余只,在晓岚港偷运谷米出境,被农工会发觉后,立即组织上千人手执梭镖、大刀、木棒连夜赶至晓岚港,不仅将所有的偷运谷米的船只全部押回农工会,还把为首的几个坏头头关押起来。事后,这伙坏头头戴着高帽子游场五乡,另罚款银洋200块。

此后,刘东轩、谢怀德决定发动群众,争取减租退押。他们采用发“请柬”的办法,即要土豪劣绅来农工会“商量”减租退押。可是,土豪劣绅根本不把农工会的“请柬”放在眼里,其中最反动的是岳北四霸之一的廖连元,自己不到农工会参加“商量”减租,还串通其他土豪与农工会作对。打蛇须打七寸处。刘东轩和谢怀德当即率农工会会员迅速赶到廖家,将廖连元抓获,并在廖连元的头上戴上木雕的“猪脑壳”高帽,令他边骂边游街,使昔日如狼似虎的廖连元威风扫地,乖乖地接受农工会的规矩:“进行二五减租”和“三成退押”。

岳北农工会成立两个月,会员增至10万多人。毛泽东、邓中夏等人多次撰文赞扬。

赵恒惕对岳北农工会极端仇视,即派亲信率“亲兵营”前去镇压。他们不只是焚烧了岳北农工会会址及农工会会员住房多栋,还将刘东轩、谢怀德等70多名会员抓捕坐牢。农工会总代表廖芳菊、周德二、赵炳炎等人先后惨遭杀害,岳北农工会遭受巨大的损失,革命被迫转入地下。刘东轩和谢怀德在监狱里铁骨铮铮,敌人对他们软硬兼施,都以失败告终。

毛泽东得知刘东轩和谢怀德不幸被捕的消息后,四处奔走,组织力量,进行营救,使他们终于逃出虎口。

1926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之后,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刘东轩和谢怀德得知后,连夜奔赴广州。毛泽东在和他们谈到岳北农工会时,作出这样的评价:“衡山岳北农工会成立不足三个月,虽然被赵恒惕用武力扼杀了,但岳北农工会诞生的意义较法国巴黎公社并不逊色。这是中华大地最早的农民革命组织之一,是湖南农民运动的先声。她在广大农民中传播的火种必然像飞蝗蔓延三湘四水。湖南农村大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而来。”

刘东轩后来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而后,任中共祁阳县委书记,后因叛徒告密被捕,1928年6月被枪杀在祁阳城外。刑前,他对13岁的弟弟刘从然说:“我死后,你上山冈山找毛委员去。”

谢怀德后来也参加了秋收起义。1928年1月在安源附近的一次战斗中负伤。他在老家养伤期间,不幸被捕,敌人不但杀害了他,还残忍人性地将他的尸体砍成四块,一块一块地悬挂在大树上示众。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专题印发了几位烈士的材料,其中有谢怀德烈士生前英勇斗争的事迹,与会者无不深表敬佩,为他志哀。

岳北农工会虽然惨遭失败,但岳北农民运动的烈火并没有熄灭。毛泽东此次走向岳北,就是为岳北的农民运动再添上一把干柴。

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去岁回湘养病,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大会在致词时,称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

他在大会上作了演讲,他指出:“只准地主向农民作斗争,不准农民向地主作斗争的人,就是在帝国主义、反革命一方面,就是破坏革命的敌人。”

1927年1月4日,他在戴述人的陪同下,从长沙乘船驶向银田,他将从那里开始对湖南农村的考察。

### 三

1月5日中午,毛泽东来到他非常熟悉的银田寺。他在白庙召开了座谈会,由于群众爱听,下午座谈会没有开完,晚上又接着往下开。1000多名农协委员聚集在一起,聆听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说:“现在韶山一带的土豪豪有的被镇压了,有的被吓跑了,你们看,我们的革命是不是成功了?”台下有许多人回答:“我们成功了,我们胜利了!”

但也有一些人在细声细语地说:“革命还没有成功……”但他们又生怕把话说错了。

毛泽东点了点头,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说道:“对啊!革命还没有成功。我们的任务不光是打倒几个土豪劣绅,还要推翻整个旧世界。要推翻整个旧世界,靠一个人不行,靠一个村也不行,中国的劳苦大众,必须合群奋斗,才能争取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的一席话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大大鼓舞了农民们的斗志和勇气,会堂上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群众大会之后,已是深夜时分,毛泽东又召集银田一区农会的负责人开会,认真听取了农协委员们告诉毛泽东,原团防局长汤峻岩等自民国二年以来就杀人五十多个,活埋了四人,最先被杀的竟是两个无辜的乞丐。

毛泽东说,地主阶级就是通过各级政权对农民施行压迫的。团防总局,团防局就是军阀剥削人民的代表机关。不用武装打倒他们,农民就翻不了身。

1月6日,毛泽东到了清溪寺。清溪寺现改为清溪镇,为韶山市政府所在地。当时,这里还是一个人口不到千人的小镇。毛泽东得知这里是一个组织很有权威,大多数的土豪劣绅都被打倒了,农民扬眉吐气,心里十分高兴。毛泽东从农民所遭受的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沉重压迫切入,指出农民阶级提出革命要求,有其必然性。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政治,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不过是地主的表征,所以每朝皇帝的倒台,就是地主阶级的分裂。他分析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指出,从秦末农民战争,直到太平天国洪秀全起义,无不是因为土地集中,地主残酷压迫农民,农民不堪忍受而被迫揭竿而起。农民起义的失败,就是因为农民起义代表农民利益而不为地主阶级所容忍,而遭镇压。因此,一部中国政治史,围绕的就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利益的斗争史。

韶山冲离清溪寺约十里左右。韶山冲的农民听说毛泽东到了清溪寺,7日早上组织了五六百人的队伍,敲锣打鼓来迎接毛泽东。

在韶山毛震公祠,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我前年离开韶山,至今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家乡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要感谢农协,感谢父老乡亲们。你们看,今天我毛震公祠来了这么多堂客们(堂客,韶山方言,指已婚的妇女),这么多年轻妹子,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呀!斗倒了土豪劣绅,妇女们翻了身,进了祠堂,我毛润之你们还高兴。”

是的,韶山的农民运动令毛泽东异常兴奋,因为这里是他的家乡,农民运动从这里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倾注了他的心血。

1925年正月14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了离别多年的故乡——韶山。他蓄着长发,身穿一件褪色的织布长袍,脚着一双旧草鞋,身后跟着怀抱次子毛岸青的爱妻杨开慧和三岁的长子毛岸英。毛泽东在故乡养病的几个月里,在韶山这块土地上点燃起农民造反的烈火,使韶山的乡亲们

在烈火中获得了新生。这年6月,在毛泽东旧居的阁楼上,毛泽东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自此,韶山人终于抖落了眼中的阴霾,走出了狭小的天地,举起了“革命”、“造反”的大旗。他们成立了“雪耻会”,打土豪,分田地,气势如虹。

此情被报告到湖南省长赵恒惕那里,赵恒惕下令湘潭县团防总局派兵捉拿毛泽东。在乡亲的掩护下,毛泽东化险为夷,于8月28日离开韶山,前往广州。

虽然毛泽东离开了韶山,但他点燃的革命之火,却熊熊地燃烧起来,韶山出现了空前的大革命。

经过一年的时间,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起来。这怎么不令毛泽东高兴呢?7日下午,毛泽东被乡亲们簇拥着又来到了毛震公祠。在这里开了一个大会。首先,他肯定了韶山的农民运动,接着给大家讲国内外形势。他说:“有人讲农民运动糟得很,我看农民运动好得很。农民打的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把几千年的封建地主的特权打个落花流水,有哪里不好呢?

### 一

1927年1月5日,湖南湘潭县,在一个叫银田的小镇东边的一条小河流上,从长沙方向驶来了一艘乌篷船。34岁的毛泽东站在船头上,他身着青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虽然有些消瘦,但双目仍炯炯有神。他临风而立,环视着故乡的山山水水,头脑里在谋划着如火如荼的明天。他此时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他此行的目的,是对湖南农民运动作一次认真的考察。考察地点,是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几县。湘潭是他此次考察的第一站。

关于这次毛泽东考察的路线问题,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是乘车到湘潭,当晚住湘潭农协,第二天再乘车至七里铺,又说至云湖桥,步行至银田;又一说法,是毛泽东从长沙乘船至银田。此次采访中,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是乘船而至银田的。

银田,是湘潭比较繁荣的一个山区小镇,这里距湘潭约20公里,距韶山大约也有20公里。小镇虽小,但却有水旱码头。因靠码头之便,附近十里八乡的村人赶集上店,或做生意买卖,皆奔银田而来。韶山冲是比较贫困的村子,那里的人卖些山柴,常常是起五更、爬半夜,挑着担子到银田来卖。

银田镇紧靠河边有一片低凹处,那里有一座庙,唤名白庙。庙院中央生长着一棵有几百年历史的白果树,白庙是不是因此树得名,因没有认真调查,不敢妄断。从白庙向河边走,是一个缓坡的河滩。通向小河的路,皆是青石铺就,在小路亲吻河水的地方,不言而喻,就是当年的河边码头。上世纪初年,银田、韶山一带的人,总要闯荡外边的世界,十有八九要从这里登上小船,经一天的水路而抵达长沙,然后从那里走向他们确定的目的地。

毛泽东1911年第一次离开家乡,就是从银田这个码头登船,沿着这条小河走进长沙的。如今他再次归来,将在生育他的这块土地上,播洒下革命的火种。行前,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专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将巡视重要意义六项“通知各县党部,要求协助做好考察工作”。

毛泽东与戴述人于1927年1月4日离开长沙。当晚夜宿何处,无据可查。有史可记的是,1月5日他乘船到达了银田。

### 二

瞿秋白曾说过这样的话:“彭湃、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这个评价是非常恰当的。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毛泽东则是中国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和理论家。

对农民,毛泽东自然十分熟悉。他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然而,对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他的认识仍然经历了一个过程。

建党初期,他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等正在提倡乡村教育。恽代英1923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

中国早期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正全力从事工人运动的毛泽东,没有完全忽视农民问题。1923年4月,湖南水口山矿区工人罢工胜利后,毛泽东派工会领导成员,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开辟农运工作。白果乡的农民在水口山做工的很多,那里有较好的工作基础。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在9月间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一万多人。白果是湖南省长赵恒惕的家乡,他自然不能容忍,在他的后院起火,屁股冒烟。是年11月,他派兵镇压了那里的农民运动。

刘东轩、谢怀德回白果开展农民运动时,毛泽东已到广东出席中共三大去了。

参加这次大会的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新问题——农民问题,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张说:毛泽东向大会提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

从党的三大开始,毛泽东将他的注意力转向农村。1925年初,他回到韶山,创建了农村中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中共韶山支部。

1926年3月,毛泽东出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泽东最富有特色的贡献是: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这就比较具体地说明了中国革命同盟军这个问题,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毛泽东并不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但他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度已走在前列。他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发表后,很快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1926年这个时段,毛泽东无疑已经成为在全国最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

1926年10日,毛泽东出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他不愿坐在大城市里去指导农民运动。为了实施农运计划,1926年11月他赴长江沿河一带视察,联络江西、湖南、湖北诸省国民党省党部,商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南方各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这时,在人们面前也出现了一系列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成了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

国民党右派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是“扰乱北伐后方”等等。一些中间派分子也开始动摇起来,说农民运动已经“越轨”了,应该加以限制,防人利用。

关于农民运动的争论,也反映到党内。陈独秀认为湖南的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妨碍统一战线”等等。

1926年12月初,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武汉。他在汉口参加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他在会上发表看法,不同意陈独秀关于农民运动的观点。虽然不同意陈独秀的观点,但他一时还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对。

当面对着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出决断时,毛泽东历来主张应该从调查研究入手,把事实先弄清楚。带着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的问题,他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12月17日,他从汉口到了长沙。

此时,湖南农民、工人代表大会正在举行。大会对毛泽东的到来,联合举行欢迎会,欢迎会的《通告》上这样介绍毛泽东:“毛先生泽东奔走革